

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环球热点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新发布的报告称，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刺激了全球能源转型投资，但投资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可用于投资的资源。

专家指出，当前，国际社会亟需加强能源合作，切实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突破能源转型瓶颈，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步调差”明显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启动“加速度”。在《2023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2022年的全球能源投资额飙升至创纪录的1.1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化石燃料投资。国际能源署今年发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报告也预计，受能源危机推动，各国可再生能源设备投资明显提速，未来5年全球装机容量有望接近此前5年增量的两倍。

另据英国能源智库Ember日前发布的《2023年全球电力评论》报告，2022年，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占全球电力结构的39%，创历史新高。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从2021年的10%上升至2022年的12%，未来有望继续增长。

然而，在全球能源转型持续发展的同时，南北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步调差”。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2/3的人口，但其清洁能源投资只占全球的1/5。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支出仍停留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时的水平。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世界上近60%的最佳太阳能资源都在非洲，但该地区目前的太阳能输出量仅为美国的1/10。目前，全球约有9000座煤电厂，其中3/4位于发展中国家。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关心环境，而是因为煤炭是他们负担得起的最好选择。对这些国家来说，没有更稳定且廉价的替代能源。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离不开煤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在能源投融资和能源技术发展等方面，全球依然存在显著的“南北差距”。在能源投资方面，近年来，受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多国纷纷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其中，资本充足率

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及非洲国家等则进展缓慢。在能源技术发展方面，发达国家不仅加强了对能源相关新兴技术的政策指引，这些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加快了新兴技术研发，而“南方国家”在缺乏资金驱动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失衡，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巨大挑战。

多因素影响

不少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缺乏能源转型的“启动资金”，是出现“南北鸿沟”的重要根源之一。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研究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深陷“越贫困、越难发展”的“能源贫困陷阱”：他们负担不起清洁能源转型前期的高昂成本，且难以获得融资，被迫依赖化石燃料，承受化石燃料巨大的价格波动，并付出高昂的长期成本，陷入能源结构难以升级的恶性循环。

发达国家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加大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融资缺口。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发达国家始终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欧洲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25年对非洲较穷国家的气候项目财政支持增加一倍，这一承诺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

外部冲击进一步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成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3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债务风险等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限制了他们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020年和2021年，发达国家用于疫后复苏的资金支出为人均1.22万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30倍，是最不发达国家的610倍。

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峰会上表示，由发达国家设计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

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前发布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版中警告称：“随着全球经济在金融动荡加剧的情况下放缓，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持续多年的经济困难，这对其公共投资造成负面影响。”

正如崔守军分析指出的，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南北鸿沟”日益显著，原因至少有三方面：首先，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推动能源转型时的方针和策略可能更趋于保守，导致投资不足。其二，地缘政治的回归、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两个危机的叠加，使部分发达国家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在高科技和能源投资等领域更注重增强自身投资，而非面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南北合作。其三，美联储等带头激进加息，导致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和偿债成本大幅攀升，进一步趋向以保守态度面对能源转型投资。

此外，“南北分歧”也持续阻碍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承受能力不同，南北方国家在气候和能源转型政策、历史排放责任与补偿、碳排放权等问题上长期持不同意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除了注重减排，他们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其他优先事项，如公共卫生、减贫、经济增长等，因此有必要平衡发展和减排，探索适合自己的减排路径；同时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减排资金和技术。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认为，应该基于目前状况，寻求能源结构转型，同时敦促发展中国家加快气候友好型发展。

需合作应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脆弱国家亟需更多援助来增强其能源转型能力。然而目前融资“太少、太慢”，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比预估需求量低了5—10倍且差距还在扩大。到2030年，估计

每年需要1600亿至3400亿美元，到2050年为3150亿至5650亿美元。但目前支出还不到总额的1/10。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前瞻报告》显示，当前，能源转型投资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并且只集中在少数技术上。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为0.5万亿美元，而为了实现1.5℃的气温目标，各方每年还需投资这一数字的3倍以上。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中国国家能源转型的资金支持。只有集中力量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的瓶颈，释放其巨大市场潜力，才能早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碳排放造成的影响不分地点，而且碳排放可以转移。因此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必须是全球性应对。发达国家在能源转型问题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自己。”林伯强说，“各国应鼓励以贸易全球化支持低碳全球化，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要弥合‘南北鸿沟’、促进能源转型，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南北协商合作。”崔守军表示，“在南北合作方面，金砖合作机制大有可为。金砖五国拥有较强经济基础，同时具备推动能源转型的意愿和行动。此外，金砖国家设立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有专门款项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投融资，有望为全球能源治理和南南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崔守军表示，南南合作机制对推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做法赢得了广泛认可。“中国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传授技术、分享经验，为全球能源转型注入正能量。未来，各国应继续凝聚合力，促进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发展鸿沟、推动包容发展，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崔守军说。

上图：在南非北开普省德阿镇，中国龙源电力集团南非公司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风机。新华社记者 吕天摄

观象台

4月6日，巴西总统卢拉签署简短声明，宣布巴西将重新加入南美国家联盟(以下简称南美联盟)。同日，阿根廷外交部发布声明，就该国再次加入南美联盟的决定正式通知该组织各成员国。南美第一和第二大国不约而同宣布重返南美联盟，彰显这个南美地区最重要的地区一体化机制迎来了久别的“春天”。毫无疑问，这将在拉美、西半球乃至全球产生重要影响。

南美联盟的雏形源于21世纪初以南美左翼国家为主力的地区一体化机制，其初衷是“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新自由主义及西方跨国资本对地区经济的巨大冲击、开启南美团结自强序章。此后，在抗衡美国霸权、捍卫地区利益的过程中，这一机制日益发展壮大。2005年，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左翼领导人公开否决美国为全面控制拉美而提出的“美洲自贸区”计划。这一举措加速了南美联盟成型，也表明了南美国家的态度：只有在政治和外交上进一步强化团结、加强融合，才能有效抵抗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干涉和控制。2008年5月，南美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自此，南美联盟成为美国及南美右翼力量的“眼中钉，肉中刺”。2013年之后，地区经济形势恶化、社会动荡加剧，多国政权“左下右上”。美国趁机拉拢地区右翼国家，以意识形态挂帅、以是否支持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划分阵营”，组建由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国家参加的所谓“拉美进步论坛”，分化南美国家团结。阿根廷、巴西等国纷纷宣布退出南美联盟。南美一体化在美国的破坏和打压下陷入低潮。

2018年以来，拉美左翼在各国纷纷重掌政权，开启地区新一轮“左转”浪潮。各国清醒地看到，拉美近年来内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外部国际影响下降，重要原因在于未能有效凝聚地区政治合力、未能形成内部统一市场，从而被美西方跨国公司“各个击破”，成为全球竞争的“落后者”。此后，地区大国逐渐开启地区一体化“复兴之路”。巴西总统卢拉今年1月初就任后，首个出访国家就是阿根廷。双方会晤聚焦如何密切战略合作、重新激活南美联盟。双方提出建立“南美洲共同货币”的倡议，震惊全球金融市场，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通过团结自强摆脱西方霸权的重要尝试。

其实，南美联盟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最初设想中，南美联盟希望仿效欧盟，“以一个声音说话”，设立统一关税、发行统一货币、组建统一议会，成为发统一护照，建立统一军队，继而实现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所设想的“独立与统一”。这正是美国“门罗主义”最为忧虑和难以容忍之处。美国自始至终都将拉美视为其“后院”，既不能接受拉美与域外国家合作，更不能容忍拉美国家脱离美国控制与干涉而真正独立。

回顾20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美拉关系，双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根深蒂固。从美国侵占墨西哥国土、将中美洲变成“香蕉共和国”、霸占巴拿马运河区，到支持智利皮诺切特政变、武装入侵格林纳达、无理粗暴制裁古巴和委内瑞拉，美国对拉美的威胁和伤害使拉美国家对美国怀有深深恐惧和厌恶，正如很多墨西哥人无奈的感叹：“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拉美国家唯一的应对方式只能是团结起来，强大自己。

当前，南美国家联盟东山再起，既折射出美拉之间复杂、敏感而又并不平等的关系，更反映出南美乃至拉美国家团结自强、反抗霸权、寻求自我的现代化道路的坚定决心。(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副所长、研究员)

南美国家联盟东山再起凸显地区团结自强决心

□ 孙岩峰

美国仇恨犯罪案件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李志伟

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年度仇恨犯罪报告补充文件显示，2021年美国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同比激增11.6%，64.5%的受害者因为种族偏见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分析指出，愈演愈烈的仇恨犯罪凸显美国人权痼疾，包括原住民、非洲裔、亚裔、拉美裔等在内的少数族裔长期遭受普遍性、系统性的歧视，美国政府无视国内种族歧视、仇恨犯罪、枪支暴力等人权问题。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定义，仇恨犯罪是指全部或部分犯罪行为是基于种族、宗教信仰、性别等实施的刑事犯罪。根据最新文件，美国仇恨犯罪案件从2020年的8120起上升至2021年的9065起，受害人数达1.24万。美国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乔纳森·格林布拉特表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证实了仇恨犯罪在2021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

尽管此次公布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但美国舆论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报告数据并不能全面反映美国仇恨犯罪激增的严峻形势。美国沃克斯新闻网报道说，这份最新文件显示，美国的仇恨犯罪正在上升，而且情况可能被低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研究员雅各布·卡普兰表示，由于多重原因，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并不完整，按照该机构定义，被视为仇恨犯罪，需要有证据表明犯罪是由偏见所驱动，但这是很难被证明的。而且受害者在遭遇这些犯罪活动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报告，但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并不多，有时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仇恨犯罪。

美国科罗拉多州亚裔圆桌会议成员乔治·桑村说：“人们不太愿意向警方报告仇恨犯罪，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不会有结果。”反诽谤联盟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成员杰里米·谢弗说：“让我担心的是，很多人开始认为‘仇恨行为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人们出门去杂货店、坐公交车时，已预感到自己可能会被骚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美国沃克斯新闻网称，尽管关于仇恨犯罪的数字不完整，但这些数据也是“可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非洲裔是该类犯罪最常见的目标，针对这一群体的仇恨犯罪从2020年的2871起增加至2021年的3277起。此外，2021年成为反亚裔仇恨犯罪最严重的一年，亚裔受害者数量是前一年的两倍多，从2020年的249起飙升至746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认为，10年来，美国仇恨犯罪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都受到了充满敌意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

虽然美国司法部已将针对仇恨犯罪的执法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白人至上主义确定为美国最持久、最致命的威胁，但未能改变美国社会对仇恨犯罪加剧的担忧。“这种趋势令人忧心。”莱文表示，他所在的研究中心收集了美国32个大城市的数据，显示仇恨犯罪案件在全美范围内持续上升。莱文说：“这些城市实际上是全美数据的晴雨表。无论你以哪种方式分析数据，都令人震惊。我们正处于一场支离破碎的暴力风暴中。”



环球掠影

铭记历史

根据犹太历法，今年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从4月17日日落开始至18日日落结束。图为一名男子日前在耶路撒冷亚德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陈君清摄